

以传播艺术之美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资华筠

这里所关注的“美”，不是人类

共通的审美心理机制所决定的“大同”，也非个人的气质、修养、人生体验所制约的“小异”。而是因宏观文化环境造就的具有民族文化特异性的“共有审美特征”。在民族内部它是“同”，对于不同民族而言，它又是“异”。这种审美特征的“异、同”，维系着各民族舞蹈风格的鲜明性和相对稳定性，却非一成不变。

时代的变迁影响着人们的审美心理、审美取向，它往往在群众自然传衍的民间舞中有所反映，如流传于安徽凤阳、怀远一代的汉族民间舞“花鼓灯”，其源流可追溯至唐宋更替时期，其原初功能兼有祭祀与农乐，其场面宏大的群舞和表现男女情爱的双人舞构成的传统样式，流传至今。它不仅成为淮河流域群众欢庆节日的自娱性舞蹈，也催生了不少取材于“花鼓灯”的优秀舞台作品。此舞中的女角称“兰花”，早期大都由男性扮演，受封建社会审美观的影响，存在着以“跷功”模仿小脚的舞步。随着时代的发展，老艺人自动舍弃了模仿小脚的“跷功”，年轻人扮演“兰花”多为女性。这种变革并未影响这一舞种的基本风格。与此相类似的例子，在民间舞的发展中非绝无仅有。

时代性审美观的变化，也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不同时期的舞蹈创作。相比较而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舞蹈，如《荷花舞》、《红绸舞》等，崇尚自然、和谐之美，更贴近“原生形态”的舞蹈风格。而改革开放以后新生代舞蹈编导的作品，则采取夸张、变形的的手法，追求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彰显主体意识。不同的艺术家取材于同一民族的舞蹈元素，由于自身生活感受、阅历的不同，可以创作出多样化的舞蹈，譬如当代十分著名的舞蹈家杨丽萍表演的《雀之灵》，与我们表演的《孔雀舞》各具审美特色。

显然，时代性审美观的变化与艺术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却有规律可循。依我之见，举凡优秀的民族舞创作，无论以怎样的手法实现个性化的创造，都应凸显民族舞蹈的优质基因——不只关注动作形态，更要关注其文化特性，这样才得以延续其“不相对于那个民族或那个时代”而具有恒久性的审美价值。“复制原生性动作”不可取，淡化或劣性变异更具危害性。如：当下，确有一些民族舞蹈(含专业性创作和旅游景点的表演)迎合低级趣味，追求感官刺激，严重损害了民族舞蹈的审美品位，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倾向。

以自身形体动作作为艺术媒质的舞蹈，当人们亲近它时，会感悟到其作用于人的生理、心理的冲击力，更直接、更强烈。因此以传播舞蹈之美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存在一定的优越性。它所具有的直观性、形象性、动态性及其表意与审美、抽象与具象相结合的呈现方式，使这种“对话”在展现、观赏舞蹈美的分秒之间即可实现。但是，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较，舞蹈存在着“自娱”与“娱人”的美感差异性，如画家与观众都通过视觉来欣赏绘画作品；演奏家、歌唱家都通过听觉来感受音乐。舞蹈却是通过动感来自娱，而娱人则要以他人的视觉来实现其审美功能。因此，对其审美、表意元素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真正“读懂”舞蹈——尤其是异域性的，并非易事。这说明，践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不能浅尝辄止，而应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和更高层次上，凸显各自的文化特色，使其更具深远意义。

(本文系作者在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上的演讲)

可贵者胆 所要者魂

莫建成

的竹……都是我描绘的对象。我望着那浑厚苍拙的山川巨石感受着大自然的造化之美，品味出世道之沧桑。我画山石林木、山花野卉，不是简单地为它们作形似激人壮怀的遗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志者在呐喊、在奋斗，也在丰富的文化遗产中留下了他们不朽的勋绩。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一文中讲：“我们从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以为，这是爱国主义的光辉体现。我坚信，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一切有源有流，有根本有本，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注入了时代气息的艺术，必能保持它生生不息的繁衍力和常青不败的艺术魅力。在绘画上，我主张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绘画的优秀传统：深邃的意境，独创的匠心，风发的性灵，强烈的个性，以诗为魂、以书为骨的手段。我

以为，当下一切比较文学和比较艺术的使命，不是比出高低而是比出差异，使各缘其迹，拉大其距离，使中国的更中国，西方的更西方，使中国画以强烈的民族性置身于世界艺术之林，永葆厥美。

多年来，我以弘扬民族艺术为宗旨，除了专心致志于绘画外，也研读画史、画论、诗词等，广泛积累知识以丰富绘画语言，赋予我的画以诗情画意，以生命力，向深层次、高境界发展。诚实和质朴是一个艺术家的美德，只有这样，你才能用自己整个心灵去爱恋生活和自然。我有幸生在蕴藏着伟大中华文化的丝绸之路上。我的足迹不止一次踏入长安一带和唐代墓室壁画，以及横亘于祁连山以北的河西走廊，还有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的佛教洞窟，其中包括光照人间的敦煌和麦积山石窟。我被古人那精美绝伦的技艺所征服，如醉如痴地面壁思考，运笔赋彩。我迷恋那阴郁虬葱的山林以及那给大自然增添活力的山鸟珍禽。山间一草一木的美感能激发我的创作欲望，那含苞欲放的蕾，那芳馨远播的蕊，那随风摆动的松枝柳叶和翠绿欲滴

加严峻的挑战面前，我们务必稳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深化利益结构制度安排，力求在培育新型市场主体方面有新突破，在文化产业做大做强方面有新目标，在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机制改革方面有新探索，在制定和落实改革配套保障措施方面有新成果。

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还进一步告诉我们，在着力文化建设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想少走弯路，事半功倍，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尊重文化发展规律，尊重艺术创造法则，尊重人民群众的普遍文化诉求，在文化建设中努力做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文化体制改革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协调推进、核心价值体系与文化普适功能的协调统一、满足日常文化娱乐需求与提升文化精神品格的协调均衡、解决东西中西部地区差与缩小城乡“剪刀差”的文化战略协调布局、守护民族文化传统与着力时代文化创新的协调选择以及“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协调安排。

作为文化工作者，当前我们

使广大消费者获得更多的文化消费机会并能够进行更加丰富多样的文化选择。

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发展的动力在于始终不渝地坚持文化建设。无所作为不行，空喊口号不行，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行。要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合理加大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的投入规模，改进平均摊派投入方式，通过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提高投入效益，确保文化建设持续推进的长效机制。

要在城乡统筹的原则下，全面提高文化基础设施和服务条件的覆盖水平，努力实现各种分类指导项目指标的全面达标，尤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文化设施建设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使包括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广大中西部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跃上新台阶。要打破体制内外的分割壁垒，充分调动激励机制，汇聚人才，建立一支立场坚定、素质过硬、德艺双馨的高水平文化艺术队伍，让一大批富有时代引领能力的杰出人才脱颖而出。

生根于贫瘠的土壤，以其顽强的生命，倔强地破土而出，以其不择地而生的性格孳生蔓延，人间开始出现一片新绿。这片新绿的种子随风播扬，造成了绿色的世界。春风助其生，野火逼其长，然则它带给人间喜悦，是毋庸置疑的。诗人最是敏感，描写草的莽翰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草带来的幽情逸趣：“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可以调素琴，阅金经”；以草状离愁别绪：“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当然草也不尽富诗意，苟自甘堕落，则为腐草；挡道塞路则为崩榛；生无伦次为荒蒿。

将草比附于文艺，则有“草根文化”，这一般是中性词，言其自生自灭，言其土生土长，言其质亦且野。粗陋不等于鄙俗，野莽亦非指卑劣。这其间没有划一的属性。草根文化甚可以说

是民族文化的沃土，是不可忽视的普世同享的文化，它无所不在地注入整个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之中。

专业的文艺家们从草根文化吸取丰富的营养，远在春秋之世，孔子删诗，留下诗三百，剔除桑间濮上之音，删去郑卫淫逸之调，目的只有一个，即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这“思无邪”正是“心诚”“意正”(《大学》)的前提。历史上凡是得以流传的经典文化著述，都不会忘记这精神上根本的追求，而这“根本善”本是与生俱来的，只是发掘则有之，不发掘则消逝。

目前反对文艺领域出现的非主流倾向，“三俗”即所谓：“低俗、庸俗、媚俗”。“三俗”文化正是违背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而必以刈之的塞道崩榛和冒途致葛，它们正日复一日地浸淫以致损害着我们民族的灵魂。

草根文化倘若是真的、善的、美的那就有着不息的生命力，它们可能成长为蔽蔕的文化大树，我们可以举出东、西方的两株大树，以为比列：中国的赵本山和美国的卓别林。

他们的相同之处是：生于贫贱，衣食无告，在生活的底层跌打滚爬，最初饱受过人们鄙视的尴尬。然而他们的相同之处是都有一颗岿然不淬的纯美心灵，同时无可否认的他们艺术上有着超凡脱俗的天才。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构建和谐社会以及迈向全面小康社会伟大征程的驱动力量，是在富民强国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面对这一深刻的历史与时代命题，能否深化认识、转变观念、

事业，也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要在发展文化事业过程中，准确判断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变化，大力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迅速推进覆盖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提供内在容创新的文化艺术精品力作，积极保护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

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在资本主义上升期的美国，工业化带给人类好处的同时，卓别林别具慧眼地看到资本给社会带来的不公，机械化所自具的盲目性和对人类智慧的漠视，他用夫复何言的哑剧、用幽默滑稽的形体，展现他淋漓尽致

的批判，《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凡尔杜先生》都成为了经典之作，他对小人物的侧隐之心，包含了大师的广大悲怀，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本性的思考。

而赵本山则处于中国社会伟大的转型时期，一个备受资

本帝国主义欺凌、宰割，饱受屈辱的民族在站起来的过程中，生活最底层的族群，欢欣鼓舞地迎接中国自强、自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潮。他们有着一种对新事物的热爱和追逐，尽管其中包含了他们的幼稚、误解和小小的虚荣心，但其主导精神则是质朴、纯良和信心。赵本山的力作《相亲》、《昨天、今天、明天》、《火炬手》，都代表了亿万农民的心愿，它也引发了人们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考。

有人说赵本山的作品只是“真”，谈不上“善”，更谈不上“美”，这是我所不能苟同的。真、善、美是三位一体的艺术存在，这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美学的问题了，“真”之反为“伪”，“伪”为不善，“真”为善。真、善具之矣，美必在其中。

卓别林平足前行，罗圈腿；赵本山佝偻行，拖胫身，这都不碍其内质之美。最肤浅的审美，乃是视电视广告以剔透晶莹、袅娜

姿态为美，其实那正是丑的所在。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那希莫多，奇丑之人也。驼背、眼疾、歪嘴、行步怪诞可笑，然而雨果的伟大在于他把一个最美的灵魂渗透于其怪丑的身躯，使之千古留芳。

赵本山由于文化的缺漏，他正在努力读书练字；以其睿智培养人才，而学生中亦有不能尽如人意的，染上“三俗”之病的，恐不能归咎于赵本山。赵本山对学生的忧虑和时时的提醒，可谓用心良苦。

卓别林和赵本山都是天才的喜剧演员，亘古推出，一个节目能使亿万人同一时间捧腹不禁，迄今为止只有这两个人。能如此，于喜剧演员亦足可自慰矣。

赵本山和卓别林

在反『三俗』中的思考

范曾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王列生

创新模式，能否审时度势、开拓进取，奋发有为，能否超前设计、精心谋划、科学实施，将直接关系到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步推进速度，关系到文化建设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文化需求的公共服务效率，关系到文化建设如何才能更有力地支撑起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未来维系。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任重道远，使命光荣。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文化矛盾，有些是历史形成，有些是发展中的产物，有些会在未来遭遇，因此，克服和解决这些文化矛盾，将是文化建设长期面对的神圣使命，将会长期考验我们党的文化执政能力与文化自觉水平。

努力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不仅要大力发展文化

要大力提高文化艺术各领域的成果创新，培植具有时代标志、民族气派和世界影响的精品力作，传承民族文化经典，延续亘古悠久的中华文化血脉，既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变化的文化需要，也弘扬中国文化精神，引领人们建设崇高的精神家园。

文化发展的活力在于持续不断地坚持文化体制改革。伴随着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急剧转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完全适应更加突出，各种利益关系也在文化建设实践中亟待重新调整，旧有的文化体制结构及其相应的功能配置日益显示出对文化建设高速推进的阻碍力量，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同时也或隐或显地不期而至，正因为如此，坚持已经卓有成效的文化体制改革，就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战略任务。在新的更

的首要任务，就是认真学习胡锦涛同志7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深刻领会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讲话关于今后一个时期文化发展的战略部署。在学习、领会和全面贯彻中，要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立足本职工作，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将讲话精神切实转化为做好各项文化工作的强大动力，转化为推进文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的火热创新实践，转化为促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走出去”战略的神圣责任与光荣使命。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把出发点和着力点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蔚为壮观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就一定会全面来临，党的十七大部署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就一定会成为现实。